

王西彦
小说选

王 西 彦
小 说 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王西彦小说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41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6\frac{1}{2}$ 插页 3

1982年3月北京第1版 198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13,000

书号 10019·3275

定价 1.50 元

自序

一个作家总是用作品向读者说话，他无须在作品以外再多事絮叨。但当他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，觉得有些关于作品和自己生活经历的事情需要说明，或是从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有所体验，哪怕这些说明和体验是怎样平凡，怎样肤浅，也还是象常言说的，“有话不说肚里痒”，忍禁不住地向读者诉说一番，跟读者“扯扯家常”。

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浙东农村里度过。我出生的那个偏僻山区，村民特别是妇女们即使进一次十里路外的县城，也当作一件大事。我的父亲是私塾师，兼给人家选日子和看风水，在农村里算得上一个小小知识分子；但母亲却是目不识丁的童养媳，她在我刚上九岁那年就永离人世，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只留下一个老爱坐在灶门前默默流泪的印象。我的三个姊姊也都是童养媳，小姊姊则在男人死后把自己出“典”了，最后却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。我先在家乡私塾式国民小学里读了几年书，从“子曰”“诗云”，一直读到“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”，母亲去世后才被送到县城里去进高小和初中。读国民小学时兼做“小看牛”，侍候一张牛嘴巴；进县城新式学校后也仍然要在农忙时期站稻床角“打小老虎”。后来，

在父亲的苦心经营下，家境竟然上升到雇长工和收租谷。我的哥哥原来是个种田的高手，人还没有犁把高就能下田扶犁，插的秧也象墨线弹过似的直，很受老把式们的称赞；可是，一到家里雇起长工，收起租谷，他也就变成一个狂热到牵了耕牛去当赌注的赌徒。就是由于哥哥的“不争气”，刚刚上升的家境又急速败落了，父亲才在一场不明不白的大病后，咽下他最后一口气。

因为出生和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里，不缺乏和农民们接触的机会。他们中间，给了我较大影响的，有我的一个堂房小叔叔，每逢年节村子里放爆竹，他就不分昼夜，擎起一把长竿子谷笆，把落到自己茅屋上冒烟的爆竹扒将下来，避免起火；后来，到了抗战初期，为了无力给儿子上缴“壮丁费”，结果死在监牢里，使得小婶婶也随即发了疯，活活饿死了。还有一个堂哥哥，他原来跟随开杂货铺的老祖父住在十字路口祠堂里（我们那里叫“住祠堂角的”），而在祖父死后就和邻家姑娘结成亲；那姑娘的父亲是个外县逃荒来的，自然屋无一椽，地无半分，靠打小锣卖“凉粉”为生，晚上就睡在祠堂后边的空棺材里。堂哥哥自己挑炭，女人掂柴打短工，一家连小孩子都满身褴褛，形同叫化。还有个名叫“金妹伯伯”的老长工，他小腿的直膂骨上烂成一个小洞，每天晚上都要流着眼泪，从里面挖出一团血脓模糊的破布，在冷水里洗了后又塞回去。他们都是我最早的启蒙教师。这不只是指他们的身世遭遇使我认识到生活的悲苦，而是他们传授给我不少历史知识和神鬼故事。例如小叔叔，虽然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，却满肚子《三国》故事，能把个“赤壁之战”说得绘声绘形，使你感到有如身临其

境。金妹伯伯则好象来自鬼魂世界，和那些男女鬼魂都有很深厚的感情，能把他们说得那么刚直，那么善良，那么讲信义，甚至还能装起细嗓子学女鬼的娇声。堂哥哥上过蒙，能读《三国》和《封神》，而且博闻强记，见多识广。是在他的影响下，使我上学以后，废寝忘食地耽溺在那个神奇世界里，热烈地崇拜起长坂坡前吼得连水也倒流的张翼德，还有手套乾坤圈、脚踩风火轮的哪吒太子。……

虽然当时我还是个用看待万花筒的眼光看待生活的小孩子，可是我觉得自己后来的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上，是和他们的接触有关的，甚至不妨说是他们培养和诱导的结果。

我的写作学习，开始于三十年代初，正当“左联”成立的时期。可以说，我是在左翼革命文艺运动影响下提起笔来的。当我采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来描写社会现实时，浙东家乡农民的苦难生活，就以一种十分鲜明的形象重现在我的眼前。我的第一篇习作，就是诉说农村妇女的深重苦难的。以后所写的反映浙东农民生活的作品，也几乎都可以从实际经历里找到真实的模特儿。

在这个选集里，我把《鱼鬼》和《寻常事》放在前面。一则，它们写的都是抗战以前的农村生活；再则，更重要的是，《鱼鬼》描写的，就是我一个堂房兄弟。也许会有读者觉得《寻常事》的故事写得过分悲惨了，但我脑子里还保留着更黑暗的记忆。至于其他各篇，《老太婆伯伯》中那老太婆伯伯，模特儿就是我那堂房小叔叔，连绰号也是他原有的。在《黄昏》中那不幸的福田媳妇身上，有着我亲姊姊的影子，“福田”是我大姊的村

子的名字，遭遇近似我那惨死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小姊妹。《福元佬和他戴白帽子的牛》和《刀俎上》都写到老农民对牛的爱惜之情，“炒菜要油，耕田要牛”，牛和农民原是相依为命的，但福元佬和荣林爷都失掉了他们的牛，荣林爷并为此失掉了自己的生命。说实话，我在重读这两篇旧作时，心里充满凄楚。在长期陷入停滞状态的历史里，中国的农民经常处于“想做奴隶而不得”的境地，他们的确过分地忍受，过分地相信宿命了。不过，我们浙东的农民却是倔强的，我少年时期就看到过乡下的农民高举锄棍大刀，浩浩荡荡冲进县城捉拿知县老爷的壮举。我的确遗憾于未能把农民的性格写得坚强一些。

在初期作品里，《曙》是比较特殊的一篇，它是我过去唯一描写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的作品。当时我很少接触工人的机会，只曾在上海工人区住过一个很短暂的时期，就大胆地写下这篇东西。回想起来，这显然是受到左翼文艺运动的鼓励的结果，而且当它在“左联”主持的《文学界》上发表出来时，也曾得到很多朋友的鼓励。抗战期间，我把它收入一个短篇集。解放后把集子里的和最初发表在刊物上的对照了一下，发现好几个地方都有了改动，例如工人们斗争的对象“资本家”改成“汉奸走狗”之类，一望而知是为了当时出版的方便，我都重新改了回去，使它保持原来的面目。不用说，现在看起来，这是一篇写得很幼稚的习作，保留在这里，只能算作自己写作史上的一个小小的纪念。

另一篇《古城的忧郁》也较为特殊。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前夕，发生在故都北平的一些异常现象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种种侵略行为的凶残和野蛮，不是身经目睹的人，恐怕

很难想象；而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政府种种措施的屈辱和无耻，如果不曾亲临其境，自然也同样很难想象。但一方面有侵略和压迫，另一方面必然也有反抗和斗争。当时的古城，交错着黑暗和光明、屈辱和抗争、丑恶和正义；只可惜我太年青，看的既很肤浅，写的就更狭隘，不能表现当时丰富复杂的现实于万一。《古城的忧郁》是三个小小的短篇联缀起来的，大概想从几个不同的方面，来反映那种令人惊讶的特异现象。现在重读自己这一鳞片爪时，就愈益感觉到，对那个暴风雨前的黑暗时代，我们实在太需要宏伟的史诗了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我又回到描写农村生活上来。《眷恋土地的人》、《麻舅舅丢掉一条胳膊》和《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》等三篇，可以算作表现同一主题的一组。这个主题就是——究竟谁在抗战。

一九三八年春，当时还存在着抗日统一战线，我参加了党组织的一个战地服务团，到鲁南苏北去做战地宣传工作。读者中间也许还有人记得，那里是国民党的第五战区，台儿庄会战时，国民党的通讯社和报纸曾经大肆渲染，把它夸说成什么丰功伟绩。但我们在北运河两岸身经目睹的，却不仅是人民在战争中遭受水深火热的苦难，而且碰到了这样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——究竟谁在抗战？谁是抗战中的最大牺牲者？不久，位置在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线中心的徐州就被包围了，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。我就带着在北运河两岸写下的一些笔记，连同上面提到的问题，突围回到武汉。接着，又在长沙和湘西南一带奔走流转。在国民党统治区里，武汉沦陷

和长沙大火以后，空气异常沉闷，抗战刚爆发时那种曾被人称之为“廉价的热情”已经急速衰落，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索一些问题。就在这样的時候，我回到浙东家乡。正好整个浙东处于动荡危急的情形下——一部分地区已经沦入敌手，那里的人民自然经历着可怕的灾难；另一部分地区虽然还没有沦陷，但在日益变成贪婪无能的反动派统治之下，人民也忍受着无告的榨取。看起来，鲁南苏北也好，湘西南也好，浙东也好，人民特别是农民的遭遇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虽然他们受着土地的盘剥，但毕竟也依靠土地为生，他们热爱土地，总希望和土地共存相守。正是在这种地方，孕育着他们的忍受哲学和宿命观念。可是，不论在战区或后方，他们都难逃失去土地或被迫离开土地的厄运。因此，我脑子里那个“谁在抗战”的问题，又牵引起另一个问题——谁在向苦难的人民趁火打劫，汲取他们的血汗骨髓以自肥？前面提到过的《福元佬和他戴白帽子的牛》和《刀俎上》等篇，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而写的。

记得当我从鲁南苏北回到武汉时，曾经给一个刊物写过一篇杂记式文章，只是记录一些战地的真实见闻，并没有明显地回答“谁在抗战”的企图，结果却招来了某些人的责难，认为它将冲淡读者对抗战的热情。因此，我曾怀疑过自己那篇杂记的社会效果。不久后，我读到一篇出自别人手笔的作品，里面写的就是在流血牺牲的抗日战争中，有些人虽然嘴巴说得漂亮，实际却在趁火打劫；而真正的给予者则是另一些人——广大的爱国人民，他们默默地忍受，默默地流血，默默地献出生命。这不仅使我感到自己的看法得到了支持，而且使我更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的职责，认识到他应该具有自己的脑

子,自己的眼睛。

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前夕,人们曾称之为“方生未死”的年代。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时期,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化愈来愈急剧。“在我们这时代,知识分子的道路原来非常明显——踢开弱点,跨越自己,走向人民大众。然而,在知识分子中间,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强者,都能对苦难战斗,且都能在战斗里获得胜利。他们中间并不缺乏弱者,在这个苦难的时代里只合扮演悲剧的角色。”我曾在一个集子的序言里这样写。我描写的那些弱者,他们带着可以说是先天性的弱点,抱着对旧有生活秩序濒临崩溃的恐怖感,彷徨失措,徘徊叹息,不能给自己寻觅一条新路——即使道路已经明显地存在,身边的人已有不少走上它。“实际他们原来也是有热情和理想的,他们也曾经或是依然有着正义感;可是热情消退了,理想熄灭了,正义感只能化为抱怨和低吟。他们被黎明前的黑暗所窒息。虽然在他们耳边响着青春的鼓舞和胜利的腾欢,但他们却是寂寞的,而且正在被寂寞所埋葬。”这是我写在另一个集子的序言上的话,我把那集子里的几个短篇小说叫做“给不幸的力弱者唱的一阙凄凉的挽歌”。

在这个选集里,我只保存了少数这类作品,就是《乡下朋友》、《病人》和《静水里的鱼》。应该说明的是,在我描写的知识分子群像里,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焕发着青春活力的人物,出现过冲天高飞的鹰。即如《母性》吧,就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,它的主人公实际上成为我尊敬的坚强战士。那些在黎明前的浓黑里的忘我的战斗者,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界的骄

傲。同时，我在描写他们中间的弱者时，也自以为并没有忘记高擎手里的鞭子。有一位眼光锐利的新文学史编著者，指出我所以更多地描写所谓“悲剧的角色”，而且对知识分子中的弱者流露出原谅、惋惜和同情，应该从自己思想上的弱点找原因，是“作者有点被黑暗势力挤扁了”的缘故。这当然是善意的指责。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经历。我曾在那个困难的岁月里，看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受难。在灾祸的长期追逐下，他们不仅流离失所，哭诉无门，连生命也没有保障。那一幅触目惊心的知识分子的流亡图，是当时中国历史重要的一页；知识分子的忍受、挣扎和抗争，也就是中国命运的一个侧面。在时代的暴风雨里，知识分子中冲天高飞的鹰固然应该写，折翅的鸟也需要在我们的文学里得到应有的表现。我觉得，这是自己不容推卸的责任。至于《夜宴》和《风雪》，不仅近于实际经验的记录，写得也实在太显露了些，甚至《夜宴》的原题竟然叫做《兽宴》；幸而《风雪》的结尾曾闪现出一些光明，使现在重读起来还不致感到过分灰暗。

对这些旧作略作回顾，即使成绩很差，稍堪自慰的是，从最初学习写作的时候起，我走的是一条自以为是接近现实主义的道路。什么是我心目中的现实主义呢？不妨借用一位文学大师谈论文学艺术的那句人们熟知的名言，“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”。这位大师把文学艺术的使命说成是“无条件的、直率的真实”，并且指明作家决不能做“糖果贩子”和“化妆专家”。我想，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，首先是态度的真诚，是真诚地为人民而写作，真诚地站在人民的立

场上来观察生活；只有这样，他才能描写生活本来的面目，达到“直率的真实”，从自己身上消除“糖果贩子”和“化妆专家”那种催人呕吐的甜味和香气。在那个黑暗时代里，粉饰现实是一种极端可憎的罪恶。还是那位大师的说话：“在恋爱里，在政治里，在医疗里，都能够说谎，能够骗人，甚至可以欺骗上帝”，“然而在艺术里却没法欺骗”。但在我们中国，偏偏多的是“瞒”和“骗”的文艺，而且它们的子孙连绵不绝，甚至曾经有过繁殖得愈来愈多的趋势。为了遏止这种趋势，的确有大力提倡现实主义的必要。而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，我以为作家只能描写自己熟悉的对象，正如鱼儿只能在水里游泳。因此，他必须有自己的家园，自己的土地，自己在那里汲取营养，在那里呼吸成长，而且真正热爱世界。不论你有怎样出色的才能，怎样高超的修养，如果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园和土地，你就将手脚失措，一事无成。

这就是我的信条。我将用它来勉励自己，鞭策自己。

1980年1月28日上海

目 次

自序.....	1
鱼鬼.....	1
寻常事	30
曙	46
古城的忧郁.....	62
眷恋土地的人.....	99
麻舅舅丢掉一条胳膊	134
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	147
夜宴	161
老太婆伯伯	192
风雪	207
母性	258
黄昏	273
福元佬和他戴白帽子的牛	291
隔膜	312
乡下朋友	330
刀俎上	372
人的世界	394
病人	436

一个小人物的愤怒	463
静水里的鱼	495

鱼 鬼

现在，我是回到家乡来了，回到自己的生息之所来了。不消说，我原是熟悉这里的一切的，甚至一草一木都足以揭开回忆的帷帘。我曾经离开过，但现在我又回来了，我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闯入者。我岂不是呼吸这里的泥土气息长大吗？岂不是曾经给这里草茎上的晨露沾湿过自己的脚踝吗？岂不是采摘过这里的花朵，痴望过这里的流云，捕捉过这里河水中的鱼虾，倾听过这里柳荫中的蝉鸣吗？我是好象一个故人似地走进这乡间来的，我期待着一声欢愉的呼唤，一个热烈的拥抱。可是，过度的奢望，却往往只能换来空漠的失望。当我发现自己的幻想都不过是自我欺骗，什么都和意料不同时，开始我感到惊讶，随后就只有悲伤的份儿了。这里的山水草木，一一如旧，可是由于长期天灾人祸的磨折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变得更为忧郁，更为阴沉，对我也格外陌生了。其中的一部分，不管他们脸上皱纹的加多，须发的变色，背部的更加伛偻，我依然熟悉他们，喊得出他们的名字，可是彼此之间变得隔膜，变得疏远了；显然地，他们心灵的改变，比他们的外形更甚。在他们之中，直到现在，和保留在我记忆里的互相对照，

变化得最少，或者说，几乎没有变化的，只有一个神秘而固执的人，他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就是一个难解的谜，现在依然茁壮地活着，而且依然是一个谜样的人。

一提起这神秘的谜样的人，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起一个固执的影子。我不知道他确实的名字，从最初的记忆，我就知道他是一个“鱼鬼”，也只知道他是一个“鱼鬼”。由狭窄的额角、低压的发脚、浓黑的眉毛和厚实的嘴唇构成的一张固执的脸孔，这就是他，那个孩子们畏惧对象的鱼鬼。他永远是沉默的。厚厚的嘴唇好象两片岩石，紧闭不动；一双仿佛从不转动的眼睛，总是凝视着地，好象在找寻什么失物，又好象在猜测大地永恒的秘密。他的身体非常壮健，阔肩粗臂，背有些驼，走路时踏着重实的步子，却低俯着头，反剪起两手，永远保持着这同一的姿势。他的身体，他的面貌，他的举止和言语，一切都是固执的化身。

为什么这样一个会被叫做“鱼鬼”呢？你脑子里一定有过这样的疑问。不错，从小我们就这样叫他的，全村的人家也都这样叫他。这名字包含几分神秘和歧视，它取消了对一个人应有的尊敬，好象他并不属于人类的社会，他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鬼，一个真正的鱼鬼。不过，所谓鱼鬼，并不是说他为鱼类所转化，是鱼类的鬼魂或精灵——正相反，他倒是它们可怕的敌人，在捕捉鱼类时，他那固执的性格，使得它们无从逃避最后的厄运。

对于一个出身乡里间，一直对乡里间的一人一物保持着浓厚的兴趣，如象你那样的人，不消说，也一定熟悉乡里间一切生活习惯的。也许我上面一提到捕捉鱼类的事，你就会神

往于那种赤身裸体，在夏日的阳光下欢呼惊叹的景象的罢。请打开你回忆之门，展现在你眼前的，将是一个蒲杨夹岸、树荫交接的池塘，在紧急噪聒的水车声中，塘水一寸一寸地低落了，塘塍边描绘出明显的年轮一般的纹圈，水草层次分明地贴伏在污泥里，离水最早的地方，在午后猛烈的太阳下，已经开始起着细小的龟裂。水逐渐浅了，更浅了，面积也逐渐缩小了。捉鱼的伙伴先后来到了，大家携带着网罟和鱼篓，坐在柳荫下，指点着纹圈的增添。有人催促车水的：“勤脚呵！”于是，你听到一声唿哨，八条或是十条酱色出毛的腿，飞一般地轮转起来了。岸上的人都把自己期待的眼睛，投向开始变黄变浑的水；不错，还不到时候，塘底还没有分潭，鱼儿也还没有闪尾。可是，什么人全身赤裸地跳下去了？既不作声，也不招呼一声伙伴就跳下去了？唉唉，你自然知道，那如果不是照例来得最早、去得最迟的鱼鬼，还会有旁人？你看他这时在已经离水的污泥里摸索着，用手捏，也用脚踩，继续他的搜寻，固执地搜遍每一根水草和每一块塘泥。他不知道厌倦，也不知道失望。午后毒烈的太阳，一直晒在他赤裸的身上；预兆干旱的麻蝇，叮在他淋着汗珠的背上；吊在腰间的大鱼篓，一撞一簸地在他脚下投着一个奇幻的影子。对着这样的形象，你将会觉得好笑不是？但是一会儿，一声兀突，一条粗肥的乌鲰给擒住了，他若无其事地把它塞进鱼篓；一会儿，又是一声兀突，一条长滑的鳊鱼给擒住了，他依然若无其事地把它塞进鱼篓。……

岸上的人发出低微的羡慕之声了。毕竟是鱼鬼，你瞧他有着多么惊人的耐性！最初离水的污泥是一片贫瘠之地，鱼群都挤到塘底那小天地里去了，留在逐渐枯竭的污泥里的，只